

◀ (上接13版)

个为社会认知的群体，是实践并认同上述“文”的功用和价值的政治精英。这样一来，作者的这一概念就势必会与我们以往在讨论唐代的政治文化精英时，所常用的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的概念相碰撞。后者是我们研究中古士族阶层的一对惯用概念，也是我们在解释“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时固有的一个论断。

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脉络中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将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从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论中解放出来，并且也相当有洞见地注意到了，社会转型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份转变这一核心问题上。但是，诸多具体的实证研究业已指出，在唐代后半期，大族子弟在政治地位上并没有明显的衰弱迹象，而科举所择取的人才也并不是新兴士族。此外，所谓的身份，是否就必然要落实到出身上，或者诸如同样对“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有强烈意识的日本学者那样，汲汲于从制度、法律、经济层面挖掘其内涵呢？作者的视角显然与以上两者都不同，他首先指出，所谓的身份，未必一定要与出身或与制度挂钩，它更多地还应该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至于史料为什么会给人留下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相对、两者的政治地位会产生升降变化这种表面的观感，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清流”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

“清流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只面向旧门大族、或者新兴士族，只要认可并有能力的士人均可成为清流中的一员，所以唐代后期既有旧门、也有孤寒出身的清流成员。但清流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的倾向，比如越来越将“文”的能力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华，并视之为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这就导致了几个现象的出现，比如产生了一批父兄子侄相继为词臣宰相的清流家族。若如作者所说，唐代的科举是一种承载“文”的意识、认可并塑造精英身份的机制的话（序论14页），那么这种以举荐、温卷为特色的唐代科举，就是诞生清流家族的温床。同时，也正因为对“文”的政治价值无限拔高，及几乎将其视为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所以繁剧的吏干型职位日益被排除在清流的选择范围之外，唯有“字人”之职才是清

流士大夫最向往，并被作为一种“故事”而成为登廊庙的最优迂转途径。所以从表面上看，清流反倒是呈现出了一种颇似魏晋时代门阀的特征。

不管如何，文化机制与这种机制的内涵终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清流文化在唐后期与五代毕竟已显示出了它无远弗届的力量，不仅影响了政治精英的价值观与心态，而且实际影响了朝廷的用人政策，甚至向地方渗透，使唐后期藩镇的僚佐成员也逐渐产生了清流化的趋势，从而根本上支配了当时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240页）。到了唐末五代，这一原本由皇权主导发展的文化机制，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力量。

清流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的政治文化，在五代各王朝延续下来，并成为五代王朝统治模式中的核心政治文化。而作为这种清流文化代表的冯道，能历经五代诸朝而屹立不倒，其真正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以笔者之见，作者对“清流文化”内涵变化的条分缕析，其贡献并不亚于提出“清流文化”这一概念。如果说后者是目前最切近唐代后期政治文化发展内在脉络的一个概括，那么其解释力的有效性就在于，这一概念是在特定的时空和文本语境中才获得其确切的定义，才能发挥出它的解释作用。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这种“时空序列”感具有相当的敏锐与自觉，始终将其作为动态而非静态的对象来进行考察，这从他对新出墓志中词臣与词臣家族的分析顺序来看就相当明显，这是有意要寻求词臣形成的动态过程（process）。而巧合的是，对上官婉儿与冯道的研究其实也无意中构成了一组词臣发展史的研究对照，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文”与清流文化发展的一前一后两个阶段。其实这种“历史感”本应是史家应有的素质之一，但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它却很大程度地缺失了。

所幸的是，在《清流》一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感”，比如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虽然作者仅用了一篇论文《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下简称《宦官领袖》）来集中阐述这一问题，但却精彩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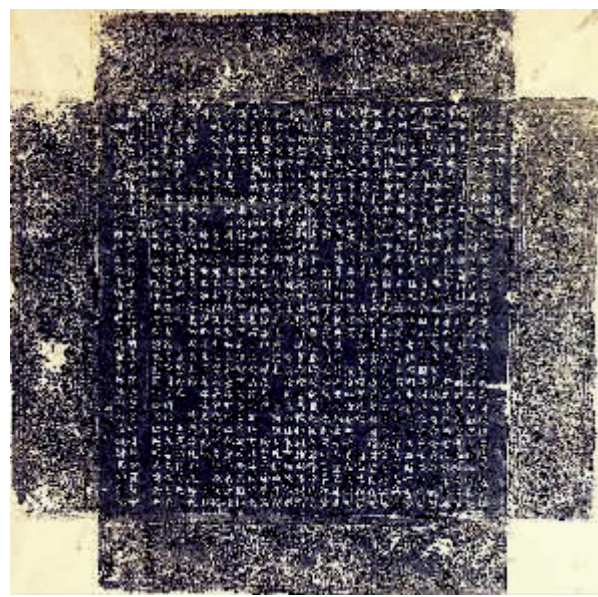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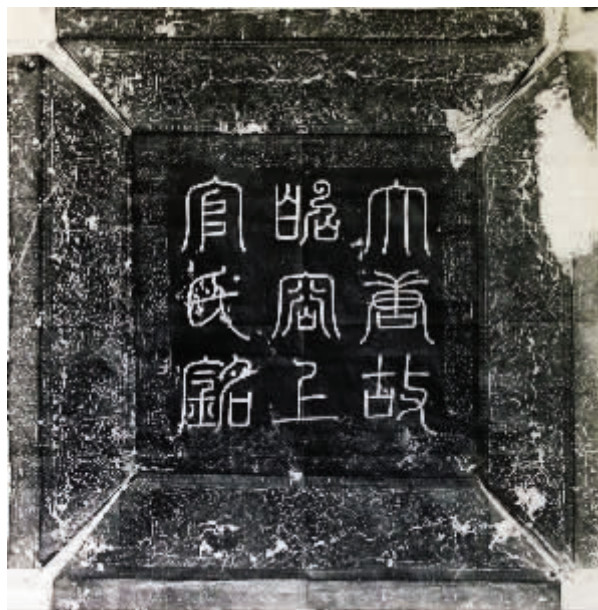
文章涉及的主人公，是唐后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诟病、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群体——宦官中的两名要员梁守谦和刘弘规。作者利用传世史料与石刻史料对这两位宦官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重建，并以梁、

刘二人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将近百位与之相关的宪、穆、敬、文四朝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妥帖地置于一系列合理的叙事框架下，展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9世纪唐代政治风貌的绚丽图景。从写作风格上来说，这篇文章最为充分地展现了作者构建复杂历史图景的高超叙述能力，使读者有回到历史现场的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此文立论的意图，并非只停留在通过复原梁、刘二位在传世文献中着墨不多的宦官的政治生涯，或是单纯呈现9世纪帝国上层政治的风貌。若是要呈现，那也是为了9世纪宦官官僚在特定场合中动态生成的精彩图景来揭示一个更重要的主题。而且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导致了史家对于宦官群体的认识长期存在误解。

此文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作者在文章最后特别拈出元和时代最著名的宦官吐突承璀，与所论的梁守谦、刘弘规二人作比较，可谓独具慧眼的点睛之笔。一方面，作者在两唐书《宦者传》“who's in and who's out”的表象记录中，揭示了现实政治中的真相，是通过文本书写揭示权力博弈的一个精彩案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作者辩证地展示了内廷体制变迁的脉络，即只有在与吐突这种代表旧体制下的“家奴”型宦官进行对比，梁、刘二人作为新兴宦官的意义以及他们最终能取代吐突的秘密才得以体现出来。这就是笔者在上文中说的，带有“历史感”的一种研究，即使是研究一个特定时期的群体成员，作者仍旧不会放过将其置于前后左右的时空坐标中进行考察、以期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机会。因此，虽然作者对宪宗时代以后的内廷宦官并没有着墨，但从他的思路来看，这一内廷未来的发展其实早已在他的考虑之中。我们也期望在这一思路下作者对文宗朝“甘露之变”的研究，能有机会尽快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上，我们主要就《清流》一书的主题展开了一些讨论，这里来简要谈一下此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色。上文曾说过，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史料的运用，是当前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其学术意义也早已为大家所认可。《清流》一书出版后，学界和相当多的读者对作者运用墓志等新出史料勾勒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工作赞许有加，同时也将作者的工作置于近年来中古石刻史料



上官婉儿墓志 资料图片

层出不穷、刊布整理工作有序推进、学界热点因之转移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实际上，作者本人也是近年来推动中古墓志研究、并在方法论上提出有建设性意见的旗手之一。

通过碑志来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辨误、增订史实当然是出土文献最显豁的功能，比如以《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以下简称《刘辟》）一文来说，其中引用《张氏墓志》再次印证官修史书里所谓朝廷在刘辟事件中的军事胜利得益于不设监军纯属无稽之谈（85页），就属于通过出土文献订正具体史实的表现。而作者写作此文本身，也是为了以新出土的诸方墓志，来帮助澄清十多年前单纯用传世文献来解读刘辟事件时一些模糊的历史环节，从而使西川事件的面相得到更丰富的展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宦官领袖》一文了，若没有近年来《梁守谦墓志》的发现，或者说，缺乏这类碑志文献，仅凭正史或私人撰作中的记载，显然是无法勾勒梁守谦与刘弘规这两位宦官领袖的生平轨迹的。

不过作者处理墓志的能力

与对墓志价值的理解，并不仅限于上述补史的史料分析层面上。《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虽然是有相关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书评，其实也是一篇系统探讨中古墓志价值与指导墓志运用的方法论层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指出，墓志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生命的文本，并不天生是证成某种已有假说的证据资料，即便它具有补史证史的实证价值，史家在面对它们时，也必须首先以一般文本理论来进行考察。诸如墓志语言的特性、体例、文本结构，及其作为一种书写方式本身的演变；进而包括作者的创作语境、读者的接受背景，相关阶层的政治心态、价值取向；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方可进一步深入墓志之中，去窥测其中所隐藏的生命律动。否则不仅实证研究很可能显得薄弱苍白，也无法真正体现出墓志资料丰富多元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清流》一书是如何展现作者上述认识的。比如就墓志语言特色来

(下转15版) ▶